

派系與宣傳——中國國民黨內的漫畫戰 (1928-1931)

張世瑛

摘 要

1924年中國國民黨進行改組，將原本散漫的組織及宣傳工作緊密地納入黨機器的指揮之下。然而，歷來研究者多將這段時期的文宣成果，歸因於國共合作下的產物，認為清黨後國民黨連帶斬斷各種通俗宣傳，即使國民黨自身也對南京十年的宣傳工作諱莫如深。這種將清黨視為抽刀斷水的二分法，不僅不正確，且有誤導之嫌。事實上，清黨後仍有眾多新進黨員留在黨內，也未放棄對中下階層的宣傳工作。近年《中央日報》附刊《中央畫刊》的重印，證明1928-1930年的南京中央，仍然存在一定的宣傳機制與動能。

過去有關國民黨派系之爭的研究，多將關懷旨趣指向在野的改組派身上，反倒對執政的南京中央，少置一詞。因此，本文擬探討1928-1931年間，國民黨內最重要的兩股勢力所進行的一場通俗宣傳戰爭，並以南京中央指導下《中央畫刊》的政宣漫畫為主要分析對象。透過對《中央畫刊》的再認識，可以確定清黨後，國民黨並未放棄漫畫宣傳，但這段時間非常短暫，1931年後國民黨文宣部門不再著力於此，確實的原因還需要更多史料的佐證。但回顧民國時期，國民黨的宣傳漫畫在黨內不同派系與中國共產黨的內外交迫下，搖擺於左、右之間的政治立場與創作理念，明顯帶著揮之不去，又欲掩彌彰的曖昧性與模糊性。

關鍵字：中國國民黨、南京國民政府、改組派、汪兆銘、陳公博

Cartoon Warfare (manhua zhan) between the Nank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Reorganization Clique, 1928-1931

Shih-ying Chang*

Abstract

Since the holding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MT in January, 1924, Sun yat-sen had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party u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organization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KMT-CCP marriage was one of convenience, as the one was in need of but also distrusting the other. The KMT desired the Soviet aids to revitalize the party, to develop a party army, and to carry out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while the CCP needed the KMT to foster his cells. It was only after the Nationalists had successfully imposed these restrictions on the Communists that Chiang kai-shek could have set out on his Northern Expedition in July 1926.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Shanghai financial circles, Chiang became more determined to persecute the Communists, and a purge committee was organized in April, 1927. Even after the purge of the Communists inside the Party, there remained, however, a broad stratum of KMT members who advocated more radical solutions to the nation's problems. Still, it was clear that many of the low-ranking and young members of the party were sympathetic with the views of the Party's left-wingers. Wang Jing-wei was their recognized leader, but he was then sojourning abroad. At home the moving spirit behind the left-wing organization was Wang's loyal associate, Chen Kung-po, who in May 1928 began publishing the anti-Nanking weekly (*Revolutionary critic*) as a mouthpiece for the left wingers.

Faced with the uncertain prospects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Chen Kung-po decided to organized the Chinese KMT Reorganization Comrades Association,

* Director, Department of Cataloguing, Preservation and General Service

or the Reorganization Clique, as it was called. Their opposition to Chiang and the authorities in Nanking was not limited only to ideological theorizing, but also extended to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popular propaganda. Many schola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tudy of the left wing of the KMT, the Reorganization Clique. In fact,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Nanking Government still adapted political cartoons of “Chungyang Huakan” (*The Central Pictorial*) in its attacks on the Reorganization clique. The cartoonist raised the banner of what was called the “cartoon warfare”. The continuity between the First United Front of the KMT and the CCP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anking Government was obvious and should not be ignored.

Keywords: KMT (Kuomintang), the Nank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reorganization clique, cartoon propaganda, Chen Kung-po

派系與宣傳——中國國民黨內的漫畫戰 (1928-1931) *

張世瑛**

壹、前言

根據西方漫畫史學者托馬斯·凱姆涅茲(Thomas M. Kemnitz)對漫畫的定義：「漫畫最早的起源是十六世紀興起於義大利的諷刺畫，諷刺畫是一種歪曲、帶諷刺成分的人或事的圖畫，方法在於誇張特性。義大利文『caricatura』一詞見於十七世紀，但實例則更早見於遠古及中世紀藝術，尤其是十六世紀明顯地出現了諷刺當時義大利社會及美學規範的畫作。十八世紀上半葉開始出現『漫畫』的稱呼，漫畫延續諷刺畫的習作方法與創作風格，主要是對政治人物、歷史情境及當前社會事件的遊戲連環圖畫，漫畫在本質上永遠是幽默滑稽的。」¹ 自18世紀開始，由於印刷技術的突破，印刷成本的降低，民眾識字教育的日漸普及，歐洲的出版事業有著長足的進展，而以新聞報刊為主要發表園地的政治漫畫，也於同期在西歐各地大放異彩。²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許多寶貴意見，特此感謝。
收稿日期：2014年7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年9月16日。

** 國史館審編處處長

¹ Thomas M. Kemnitz, "The Cartoon as a Historical Sour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4:1 (Summer 1973), p. 82.

² W. A. Coupe, "The German Cartoon and the Revolution of 1848,"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 (January 1967), pp. 137-167.

研究近代中國漫畫的歷史學者洪長泰稱「漫畫是視覺藝術的一種獨特形式，漫畫家把想法以幽默、隨意和辛辣的形象表達出來。漫畫強調的是直接的表達，用大眾化的意象，甚至是刻意粗俗的內容來取得效果。它是一種普及藝術，容易複印，是傳播思想的有效和方便的媒介。漫畫的內容淺白有趣，因此可以及時和有力地揭示事情的關鍵所在，這是其他媒介所無法比擬的。漫畫嘲諷世事，感染大眾，表面上看似膚淺，卻具有某種永恆的藝術價值。」³

以上幾位探討近代漫畫發展的中外歷史學者都肯定自19世紀以來蓬勃發展的政治漫畫，至少在兩個層面上是極為重要的資訊來源，一方面是具體反映時代的如實紀錄，另一方面是藝術家的創作獨白。政治漫畫在很大程度上呈現了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狀況，用洪長泰的話來說，漫畫「是時尚和習俗的『非官方』記錄」。⁴

根據洪長泰的研究，「漫畫」一詞在中國最早是由豐子愷於1925年5月使用，他以「子愷漫畫」的專欄名稱，在《文學周報》上連載。⁵ 不過，漫畫這門藝術與技巧早在晚清時期即已傳入中國，晚清10年間（1901-1911），在「開民智」的啟蒙熱潮下，出現大量以圖畫形式為主要內容的畫報，據筆者統計至少有40種；⁶ 這些刊物經常刊登漫畫，當時的報刊漫畫還沒有統一的名稱，出現在報刊上的稱法可說是五花八門，包括諧畫、諷畫、畫諷、時畫、時諧、警畫、喻畫、笑畫等。⁷ 而最早出現「漫畫」一詞，是在上海出版的革命派刊物《警鐘日

³ 洪長泰，〈豐子愷抗戰漫畫中的戰爭與和平〉，《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北：一方出版社，2003年），頁2。

⁴ 洪長泰，〈豐子愷抗戰漫畫中的戰爭與和平〉，頁2-3。

⁵ 據豐子愷的說法，該名稱是由《文學周報》的編輯鄭振鐸所建議。參見洪長泰，〈豐子愷抗戰漫畫中的戰爭與和平〉，頁4-5。

⁶ 關於清末10年通俗文化、民眾啟蒙與政治關係間的詳細研究，參見李孝悌，《清末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⁷ 從近年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的《清代報刊圖畫集成》、《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等一系列套書中，重印了晚清時期的畫報約30種。如果加上未被收錄其中，近年來也重印出版的《圖畫日報》、《人鏡畫報》、《醒俗畫報》、《舊京醒世畫報》、《時事畫報》、《時諧畫報》、《滑稽魂》、《雙日畫報》、《神州（五日）畫報》、《時事新報星期畫刊》、《常日畫報》、《淺說日日新聞畫報》、《白話畫圖日報》等，晚清10年間所出版的畫報，至少有45種以上。這裡絕大多數是目前中國大陸重新影印出版的畫報，如果繼續從中國各地的報刊資料中爬梳，這個數字一定還會增加。

報》上，1904年3月17日《警鐘日報》以「時事漫畫」的欄目刊載反映時事的政治漫畫，只是曇花一現，其後沒有其他報刊使用「漫畫」的名稱，直到前述1925年5月「子愷漫畫」專欄問世，「漫畫」一詞才真正普及開來。

過去學術界有關中國政治漫畫的分析爬梳，大致有兩種研究取徑，一種是偏向社會科學或藝術研究者的做法，將漫畫放在藝術發展的脈絡中，探討其表現手法與藝術成就；⁸ 另一種是歷史學界的看法與取徑，將漫畫視為政治評論與公眾輿論的代表，強調政治漫畫不僅能暴露社會現實、反映大眾觀點，甚至抗議政府作為，進而成為影響群眾心理之重要媒介。

回顧1911-1949年間對漫畫創作的學術研究，重要的通論性著作有黃遠林⁹、畢克官¹⁰ 等人的作品，專論性著作則集中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救亡漫畫現象，重要的研究者有洪長泰¹¹、森哲郎¹² 及陳逢申¹³ 等人。上述的研究取徑與豐厚成果，在分梳近代中國漫畫創作理路與時代背景上業已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礎。但這些研究成果，卻也暴露出研究者的洞見與不見，最大盲點在於他們忽略了20世紀初興起的外造型政黨，特別是以俄為師的列寧式政黨，強調在黨機器與黨組織下必須建立服從黨義、由黨中央一手控制的宣傳機制，不論是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都是切實服膺並身體力行這種思想觀念的集權式政黨。因此，20世紀興起於中國的政治漫畫，在一定比例上都屬於政治文宣的產物。

李孝悌的研究指出，早在晚清階段，革命黨人為吸收與黨，擴大宣傳效果，善於利用白話、方言，乃至富有地方風味的戲曲、歌謠等通俗形式，對清廷或保

⁸ 這類著重漫畫文化意涵的理論分析，可參見蕭湘文，《漫畫研究：傳播觀點的檢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鄧宗聖，《入鏡路徑：視覺媒體創作與方法》（臺北：麗文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及李衣雲，《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12年）等。

⁹ 黃遠林，《中國漫畫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年）。

¹⁰ 畢克官，《中國漫畫史話》（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82年）。

¹¹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93-150.

¹² 森哲郎著，于欽德、鮑文雄譯，《中國抗日漫畫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

¹³ 陳逢申，〈戰爭與文宣：以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話劇·音樂及漫畫為例（1937-1945）〉（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

皇黨進行宣傳戰。¹⁴ 對於廣大不識之無的「愚夫愚婦」來說，生動的圖像還是比文字來得親近，面對如排山倒海而來的畫報潮流，以及當時知識界啟蒙下層民眾的時代氛圍，重視宣傳的革命黨人絕不至於無動於衷，他們利用漫畫這種通俗文化的形式，來達到反滿宣傳的嘗試，相信必定會對日後國民黨重新建立宣傳組織時提供寶貴的經驗。不過，我們也不宜過度誇大清末革命黨人運用漫畫等通俗文化的宣傳成效，由於同盟會僅是一個鬆散的革命組織，與具有現代政治學意義的政黨形式相去甚遠，同盟會並沒有建立起一個由上而下的宣傳機制，不論是東京的《民報》，或是由各地黨人所創辦的革命刊物，都是報刊主事者在個人自由意志下所抒發的革命言論，也是在革命思潮激盪下的自發性行為。如果將這個時期的革命漫畫視為國民黨最早的漫畫文宣，是值得商榷的。

這種鬆散的情況，一直到1924年初國民黨改組才有轉變，此次改組，一方面確立了國民黨的完整稱謂及黨務組織，另一方面在聯俄容共的原則下，將黨組織改造成列寧式政黨；原本一盤散沙的宣傳工作，從此被緊密地納入黨務系統的指揮之下，其中宣傳部被賦予指導、檢查及糾正黨內言論機構的重任。¹⁵ 除了文字宣傳之外，包含漫畫等通俗圖畫形式，也成為黨改組後頻繁出現的宣傳利器。過去對於聯俄容共到國民革命階段的國民黨文宣工作的論述已多，然而大多數研究者，尤其是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都將這段時期的文宣成果歸因於國共合作下的產物，強調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幕後推手。¹⁶ 1927年清黨後，學界的普遍印象

¹⁴ 李孝悌，《清末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頁30。

¹⁵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pp. 318-320；呂芳上，〈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後的宣傳刊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期（1974年6月），頁413-435。

¹⁶ 不論是較早有關聯俄容共時期的研究，如王宗華主編的《中國大革命史，1924-1927》，或是最新的研究，如楊奎松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都強調共產黨員主導了1924-27年國共合作期間的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青年部及婦女部。見王宗華主編，《中國大革命史，1924-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上冊，頁105-152；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61-78。而臺灣學界的研究，也從另一種「受害者」的角度，論證並坐實了共產黨員控制聯俄容共時期國民黨內宣傳等部門的說法。李雲漢教授有關此一主題的開山之作《從容共到清黨》，在第五章第一節敘述共產黨分子對黨務的掌控，即強調工人、農民及宣傳等部，實際任事之人「幾全為共產份子所包辦。」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年），上冊，頁275。

是，國民黨在清黨分共之外，也一併斬斷對工人、農民、婦女、學生等中下階層及弱勢團體的宣傳工作。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1928年後，國民黨果真放棄文字與圖畫並重的通俗宣傳嗎？直到近年，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重印《民國漫畫期刊集粹》，其中選錄了1929-1930年《中央日報》的附刊《中央畫刊》，這份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編撰股主持的通俗畫刊才重新被挖掘出來。《中央畫刊》的存在，證明1928-1930年的南京國民黨中央雖然將中共黨人及國民黨左派分子清除出去，卻仍保留一定的宣傳機制與宣傳動能。

過去有關1928-1931年間國民黨內派系之爭的研究，王克文的〈轉變中的國民黨——國民革命時期的意識形態與派系主義，1924-1932〉，問世雖已近30年，仍是有關此一議題的開山之作，深具參考價值。¹⁷ 國內的張順良持續耕耘改組派的研究，先後發表了〈析論國民黨改組派的由來、起訖時間及綱領〉、〈論國民黨改組派在華中、華南的地方組織〉、〈國民黨中央取締改組派海外報刊初探〉、〈論國民黨改組派與中央大戰〉、〈論國民黨懲辦改組派領袖及其中央組織〉、〈論國民黨中央如何取締改組派的言論及其報刊〉、〈國民黨中央取締改組派海外報刊初探〉、〈論國民黨中央如何清除各地方黨部的改組派分子〉、〈國民黨改組派與北平擴大會議〉等多篇論文，對於改組派的史實重建工作，功不可沒。中國大陸的郭緒印長期致力於國民黨內派系的研究，1992年出版的《國民黨派系鬥爭史》是其累積多年成果的力作。近年來王克文也持續發表多篇有關改組派的重要論文，包括〈寧漢分裂前後之汪精衛〉、〈分共之後——汪精衛與國民黨左派〉、〈北伐後國民黨之黨務整理〉及〈陳公博與國民黨改組派〉等。上述研究成果，已經為1920年代後期國民黨內的派系之爭，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史實線索。然而，這些研究多半將關懷旨趣指向在野的改組派，對於執政的南京中央的宣傳攻勢，吝於筆墨、少置一詞。

本文將以1928-1931年間，國民黨內兩股重要的派系勢力——以蔣中正為首的南京中央及遙奉汪精衛為領袖的改組派，雙方在這段時間裡的宣傳攻勢，尤其

¹⁷ Ke-wen Wang, "The Kuomintang in Transition: Ideology and Factionalism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2"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5).

以南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指導下的《中央畫刊》上的政宣漫畫為主要分析對象，觀察這些富有濃厚政治目的的漫畫，究竟如何呼應時代的話語情境？所要傳達的政治意象，又是透過怎樣的手法與技巧來描繪？其主要訴求與論述邏輯為何？而這樣的漫畫語言，又是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與意識型態下產生？以上這些疑問都是本文所要試圖回應的地方。

二、宣傳革命 ——從中國國民黨改組到北伐期間的漫畫文宣

辛亥革命後，國民黨一直處於風雨飄搖、分崩離析的處境，1920年11月，孫中山在上海頒布「中國國民黨總章」及「中國國民黨規約」，擴大黨本部組織，於原有的總務、黨務、財政三部外，增設宣傳部，明定職權為「書報編纂及譯述事項、講演事項、教育事項」。這是國民黨常設宣傳機構的開端。1923年1月，進一步宣布「中國國民黨黨綱」及「中國國民黨總章」，將宣傳部職掌修正為「辦理本黨出版、演講及教育事項，並檢定本黨國內外一切出版物」。¹⁸ 宣傳部成立後的首任部長為張繼（1920年11月任命），後為葉楚傖（1923年1月任命）。¹⁹

不過，這段時期的宣傳部並沒有太多運作的跡象，也看不出出身老革命黨人的張繼及葉楚傖有任何針對黨務宣傳的言論或行動。這種有名無實的尷尬情況，一直要到國民黨改組後才幡然改變。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黨的改組，除了重建各級黨組織、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及創立黃埔軍校等重大事項外，國民黨改組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就是「回到民間來」、「與民眾共同奮鬥」，並透過宣傳的方式與民眾密切結合。²⁰

¹⁸ 「中國國民黨總章」（1923年1月2日），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70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6年），頁35。

¹⁹ 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4年），頁22-24。

²⁰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80-91。

在國民黨正式改組前，孫中山曾總結20年來國民黨從反滿、討袁到護法時期的宣傳內容與成果：

余於乙未舉事廣州，不幸而敗，後數年，始命陳少白創中國報於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以後，革命宣傳驟盛，東京則有戢元成、沈虬齋、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主張革命。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為書，尤為一時傳誦。同時國內外出版物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丕變。及同盟會成立，命胡漢民、汪精衛、陳天華等撰述民報。章太炎既出獄，復延入焉。民報成立，一方為同盟會之喉舌，以宣傳正義；一方則力闢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之謬說。使革命主義，如日中天。由是各處支部，以同一目的，發行雜誌日報書籍，且以小冊秘密輸送於各地，以傳播思想，學校之內，市肆之間，爭相傳寫，清廷雖有嚴禁，未如之何也。²¹

他認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固然得自於宣傳，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國後的失敗，也是因為忽略了宣傳。²² 而辛亥前的宣傳，是個人無組織、無系統，「人自為戰的宣傳」，「至武昌起義以後，則連人自為戰的宣傳，亦皆放棄，而不肯做矣！」²³

然而，孫中山並沒有忘記宣傳對革命的重要性，當時的國際情勢也提供了國民黨重整宣傳事業的靈感與動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宣傳在動員民眾從軍與啟發愛國熱忱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蘇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宣傳更是重要因素之一。1920-1924年間孫中山的公開演講中，屢屢提到宣傳的重要影響力；不過，正如孫中山所言，以往國民黨著重的是以識字階層為對象的文字宣傳，在推動聯俄容共的政策後，受到蘇俄代表馬林（Henk Sneevliet）等人及跨黨中共分子的影響，開始注意到工人、農民、婦女及學生等新生的群眾力量。在第一次全國代

²¹ 〈中國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收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國父全集》，第2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0年），頁185-186。

²² 〈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1923年12月30日），收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國父全集》，第2冊，頁594。

²³ 〈要靠黨員成功，不靠軍隊成功〉（1923年11月25日），收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國父全集》，第2冊，頁564。

表大會宣傳事業及宣傳組織案中，最後的決議文強調：「吾黨以宣傳事業為最重要，應舉全黨之精力，以有系統的組織，切實進行。」²⁴ 此後，「人自為戰」的宣傳成為革命共同奮鬥的事業，原本一盤散沙的宣傳工作被緊密地納入黨務系統的指揮之下，而除了文字宣傳之外，包含漫畫等各種圖畫形式，也成為國民黨改組後的宣傳利器。

根據1925年國民黨宣傳部的報告，該部所屬的國內日報有6種、週報10種、月報2種，通訊社1所；該年份出版書本30種、傳單83種，並有各項標語；圖畫宣傳品每週至少推出1種，並結合重要時事宣傳，如改組、收回粵海關、沙面罷工、商團事件、中俄協定、孫中山北上、國民會議、反教運動等，充分利用圖畫的通俗特性，達到向民眾宣傳的目標。²⁵

觀察國民黨從改組到北伐期間的漫畫文宣，主要是由各級黨組織的宣傳部及國民革命軍政治部負責製作。1926年底，國民黨宣傳部創作了一幅〈鋤列強、倒軍閥〉的漫畫，配合國民革命歌曲，傳遍中國各地，雖然畫中的筆觸異常樸拙卻構圖簡練，國民革命的目標及訴求在此一目瞭然。值得注意的是，畫中以一個手舉鋤頭的農民象徵革命隊伍，顯示左派思想在國民革命初期所展現的影響力，在他面前倒下的是戴著英國國旗帽的列強及一臉驚恐的北洋軍閥。

²⁴ 〈關於出版及宣傳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頁242。

²⁵ 「中國國民黨宣傳部報告」（1925年），毛筆原件，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檔號：412/0147。



圖1、勸列強、倒軍閥

資料來源：中國國民黨宣傳部，〈勸列強、倒軍閥〉（廣州，1926年），引自黃遠林，《百年漫畫》（北京：現代出版社，2000年），頁110。

除了黨務系統的宣傳部外，軍事體系的政治部也是北伐期間主導漫畫宣傳的尖兵。1926年6月，廣東國民政府正式通過出師北伐案，蔣中正就任總司令，成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並將原先的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改組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即俗稱的北伐軍總政治部，由鄧演達出任總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之下，各軍、師也設有政治部，構成整套獨立的行政系統。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各軍政治部利用公開演講、軍民聯歡會、化裝遊行、散發傳單、標語、畫報、旗幟，甚至使用留聲機等新式科技，把「主義」、「意識型態」等名詞灌輸到老百姓的腦海中，國民革命軍所到之處，政治部的宣傳隊伍也如影隨形，這是過去中國從未有過的作戰方式。²⁶ 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在出師北伐後，創作了這幅〈民眾的力量〉，以油印方式大量向一般民眾發送，畫中憤怒的民眾將象徵「民眾的力量」的巨棒，狠狠地打向帝國主義與軍閥，後面還有許多民眾手舉棍棒及標語牌，搖旗吶喊如潮水般湧來，標語牌上寫著「農工兵學商大聯合」、「聯合起來打倒軍閥及一切帝國主義」。這幅漫畫以象徵的手法，成功地傳達表

²⁶ 有關1920年代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的研究成果，參見呂芳上，〈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1920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為例的討論〉，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1920年代的中國——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23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2年），頁166-167。

面上兵力居於劣勢的革命軍，背後依靠的其實是農工兵學商等廣大群眾的巨大能量。據第一軍政治部的報告，當第一軍進入福建後，政治部人員即將這些宣傳漫畫「於軍行所至之處張貼」，切實發揮動員與鼓舞群眾的作用。²⁷



圖2、民眾的力量

資料來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民眾的力量〉（1926年），引自黃遠林，《百年漫畫》，頁102。



圖3、打倒張作霖、張宗昌

資料來源：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政治部，〈打倒張作霖、張宗昌〉（1927年），引自黃遠林，《百年漫畫》，頁112。

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政治部也是一支頗具成績的宣傳隊伍。北伐誓師後，第三軍5個步兵團隨第四軍向湖南出發，經過東昌、郴州、衡州、株州到達醴陵待命，從東昌開始徒步行軍，打第一線的不是武裝部隊，而是政治部的宣傳隊員。根據第三軍的政治部報告，在行軍及作戰過程中，政治工作人員成為軍隊與各地民眾間的主要橋樑，是最能喚起基層民眾革命意識的宣傳鼓動員。²⁸ 當第三軍進入江西後，時任安國軍總司令及副總司令的北方軍閥張作霖及張宗昌，派軍南下支援孫傳芳，與第三軍正面交鋒，於是第三軍政治部製作了「打倒張作霖、張宗

²⁷ 國軍政工史編纂委員會編，《國軍政工史稿》（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1960年），上冊，頁242。

²⁸ 「第三軍政治部工作報告」（1927年1月20日），毛筆原件，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檔號：412-0259。

昌」的漫畫，畫中將兩人描繪成日本帝國主義的兩條走狗，正瘋狂撲向被捆綁的民眾，而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操控在後方穿著和服、木屐、黑色面容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手中的繩子之下。這幅畫作的寓意強烈，以走狗的概念象徵北洋軍閥與帝國主義間的關係，可說淺顯易懂、入木三分，也是北伐期間極為成功且知名的宣傳畫作。

在國民革命期間，不論是宣傳部或政治部製作的宣傳漫畫，大多是以機關的名義發表，沒有漫畫家的署名，因此很難追蹤出這些畫作的創作者。不過，仔細觀察國民黨漫畫文宣的發展脈絡，至少有兩位在政治立場上分居左右兩端的漫畫家，已在此時嶄露頭角，第一位是主導國民黨漫畫文宣半世紀以上的梁中銘，他與兄長梁鼎銘、其弟梁又銘，合稱梁氏三兄弟，梁中銘在黨營文宣組織的第一個正式職務係1929年起出任《中央畫刊》主編，1932年出掌軍事委員會政治處藝術股長，抗戰爆發後兼任黨營《陣中畫報》社長。

聯俄容共階段，梁中銘曾先後為中央宣傳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繪製宣傳漫畫，由於當時創作的文宣漫畫多半以傳單方式發送，絕大多數作品都沒有署名，難以辨識梁氏兄弟確切的漫畫作品，1928年後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基礎逐漸穩固後，梁中銘及梁又銘也在南京定居下來，並在《中央畫刊》、《革命軍人畫報》等黨營畫報發表了大量的漫畫作品。²⁹ 兩人投身黨務宣傳工作的時間超過40年，筆耕不墜。

另一位北伐期間國民黨文宣系統中重要的漫畫家為黃文農，北伐軍誓師後，他祕密投身上海的革命組織，先後在上海警察廳政治部及海軍政治部的宣傳組任職，在他短暫的國民黨文宣工作生涯中，創作了許多宣傳漫畫，下面這幅〈面和心不和〉的畫作是他最初的作品，畫中兩位軍閥坐在一張長椅上握手言「和」，背後卻是兩人在長椅後面的那隻手，各自握著手槍指著對方，表面的言和全是假象，實際上是要置對方於死地，充分反映了軍閥間貌合神離、各懷鬼胎的真實情

²⁹ 然而，不論是做為藝術創作者，或是政治文宣工作的旗手，今天對於梁氏兄弟藝術成就的瞭解，其實是在油畫創作方面，目前在臺北的國軍歷史文物館、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八二三戰史館、古寧頭戰史館等，仍然保存其多幅戰史油畫作品。見〈梁中銘先生事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5輯（臺北：編者，1986年），頁432。

況。1927年4月國民黨在上海清黨後，政治立場親左的黃文農被迫離開國民黨的文宣機構。³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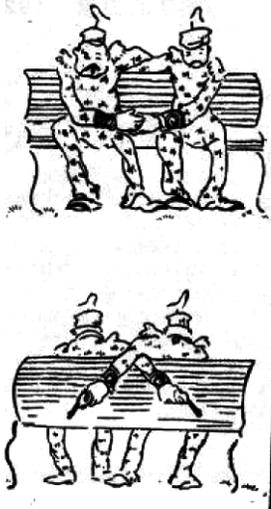


圖4、面和心不和

資料來源：黃文農，〈面和心不和〉，引自李忠清、楊小民編，《漫畫時政》（北京：現代出版社，1999年），頁31。

從黃文農的例子，不難看出在聯俄容共政策下，北伐時期國民黨的文宣組織及文宣政策受到共產黨極大的影響，例如在江西省農民協會所創作的〈一個骨瘦如柴的農民，怎能受那許多人的吸吮？〉中，畫中這個頭上寫著「農」字的人愁眉苦臉，雖已骨瘦如柴，可是還有許多人在他身上插滿管子，使勁地吸他所剩不多的鮮血，而這些吸血鬼身上寫著帝國主義者、軍閥、地主、土豪、貪官、污吏、劣紳等名字，畫上的題字向社會各界發出了讀者心中共同的質問：「一個骨瘦如柴的農民，怎能受那許多人的吸吮？」這幅由江西省農民協會創作的漫畫流通甚廣，許多農民協會都曾將其大量油印發送給農民，畫中所流露的階級鬥爭意識與人道主義關懷，躍然紙上。不難看出當時諸多宣傳漫畫都是國共合作下所激盪出來的產物，充分展現了左派思想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

³⁰ 森哲郎著，于欽德、鮑文雄譯，《中國抗日漫畫史》，頁52-53。

工作的主導權，但對國民黨改組後剛起步的漫畫文宣而言，也是一次重大的打擊與清洗。



圖6、新軍閥蔣介石甘自向墳墓裡摸索前行

資料來源：南昌市黨部宣傳部，〈新軍閥蔣介石甘自向墳墓裡摸索前行〉（1927年3月），引自黃遠林，《百年漫畫》，頁114-115。

叁、誰才是真正的國民黨？改組派的文宣攻勢

1927年8月6日，汪精衛在漢口發表〈錯誤與糾正〉一文，宣告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和平分手；8、9日，南京及武漢國民政府互電，預告寧漢雙方即將在國民黨的招牌下重新合流。13日，蔣中正在桂系及武漢方面的壓力下，通電下野；在南京成立由寧、漢、滬3個國民黨中央合併而成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委員會（以下簡稱特委會），特委會是由桂系聯合西山會議派主導，汪系反倒被摒除於外，於是汪以特委會違背國民黨法統為由，偕顧孟餘西去武漢，策動唐生智發起護黨旗幟，起兵反對特委會；10月底汪精衛及汪派重要人物陳公博、顧孟餘、王樂平、王法勤、甘乃光、朱霽青、潘云超、陳樹人等齊集廣州，企圖憑藉當地軍人李濟深、張發奎的實力，與南京特委會分庭抗禮。

然而，在11月17日及12月11日，先後發生了兩次「廣州事變」，前者係張發奎、黃琪翔在汪派的策動下，發動驅逐李濟深、黃紹竑等在粵的桂系勢力；後

者為汪派控制廣州後，共產黨以張太雷為首，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陳公博雖聯合張發奎鎮壓了這場變亂，汪派卻因此成為國民黨內的眾矢之的，李濟深、李宗仁、吳稚暉等人聲稱中共的廣州起義是汪精衛與共產黨暗通款曲下的作為；12月16日，汪精衛在不得已下再度下野出洋。

汪精衛遠赴法國後，汪系骨幹陳公博、顧孟頤、潘云超、王樂平、朱霽青、郭春濤等人麇集滬上，持續策劃反對南京中央的行動，發起改組國民黨的言論宣傳，並在數月內掀起一股要求改組國民黨的滔天巨浪。汪系這群手無寸鐵的失意文人，之所以能憑藉筆鋒，吸引國民黨年輕黨員的支持，當事人陳公博的分析頗為中肯，他認為改組派之所以能得到廣大青年的傾心相從，是有其時代背景與群眾基礎的：「清黨之後，最苦悶的是一般青年，這一般先生決意不肯做共產黨，而又苦於中國沒有出路，戴季陶先生所著的《青年之路》是不能滿足他們的知識荒的，南京中央黨部把孫先生抬起來，要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道統，他們也是懷疑的。尤其國民黨的青年，分共本來是他們的希望，但分共之後而致開倒車，則為他們所恐怖。」³¹

改組派的言論宣傳遠走在組織成立之前，1928年1月，初抵上海的陳公博，立刻寫了一篇題為〈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長文，在孫伏園主編的《貢獻》雜誌3、4月號上發表。³² 在這篇長文裡，陳氏首先批評共產黨的革命行動不切實際，甚至不符馬克斯理論，又想獨占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因此國共分家無可避免。然而國共分裂也使國民黨本身「陷於理論和行動矛盾的敗局」，使國民革命「陷於中斷的危機」。陳氏指出國民黨自1924年改組後，有三項「為黨員所共信而以為足以解決革命」的原則，分別是：一、和共產黨合作；二、打倒帝國主義；三、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

北伐誓師後，國民黨受到中共理論與行動的百般掣肘，於是不得不放棄第一項原則，可是黨員因長期受到共產黨理論與行動的影響，一旦分共出去，國民黨內也開始出現理論與派系的路線之爭，對陳公博等立場偏左的國民黨人來說，南

³¹ 陳公博著，汪瑞炯、李鐸、趙令揚編註，《苦笑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頁179。

³² 陳公博，《寒風集》（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年），甲篇，頁271。

京的清黨就像西方寓言裡倒洗澡盆的比喻一樣，在倒洗澡水的時候，連帶把澡盆裡的嬰兒也一併倒掉了。最不幸的是，在反共的藉口下，連第二、三項原則也打算放棄。陳氏以為這種傾向足以造成「黨的動搖」，必須加以糾正。糾正的方法應從3方面著手：第一、黨的本身應該統一政策，加強組織、紀律和訓練工作，並且注意黨員的成份（包括階級背景與革命性）。第二、黨應該致力於群眾運動，在農民、工人、商人、青年、婦女等工作上，不必重蹈共產黨的覆轍，但也可退縮不前。第三、澈底整頓軍隊的政治訓練，確保武力受黨的指揮。³³

在王克文的分析裡，陳氏的主張的確反映了清黨之後國民黨內年輕、滿懷理想的黨員看法，也道出了他們的心聲。這些黨員絕大多數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加入國民黨，他們所認同的是當時國民黨的激進政綱，帶有濃厚的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反封建色彩，並且與群眾運動緊密結合。清黨後，南京中央不但受到新軍閥和舊官僚的控制，且日趨保守。最重要的證據是1928年2月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廢除中央黨部原有的農民、工人、青年、商人、婦女各部，代以民眾訓練委員會，以免群眾運動再被共產黨主導而失控。在這些青年與激進黨員眼中，南京中央的舉措讓國民革命有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的疑慮。³⁴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問世後，「使處於政治逆境的汪派看到一線轉機，他們雖失去黨中央的領導權，但發現『民氣可用』，如果能造成輿論，吸引中下層黨員的支持，未嘗不是增加自己政治籌碼、迫使南京讓步的一種方式。」³⁵ 除了此文外，陳公博也在武漢分共時期出版過一本小冊子《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文中以階級觀點解釋中國近代的政治變遷，從而認為國民黨的階級基礎是農民與工人，但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必須建立在農工與小資產階級的同盟之上，因為這3個階級都受外國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帝國主義正是國民革命的主要敵人。陳氏強調國民黨在領導此一多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時，必須一方面以黨的力量來調合3個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以維持革

³³ 陳公博，〈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陳公博先生文集》（香港：遠東圖書公司，1967年），下冊，頁262-342。

³⁴ 王克文，〈陳公博與國民黨改組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4期（1997年5月），頁147-148。

³⁵ 王克文，〈陳公博與國民黨改組派〉，頁148。

命陣營的團結，一方面限制小資產階級的發展，以確保革命不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為達成這項使命，陳氏甚至主張國民黨員應維持一定的階級比例：農民占50%、工人30%、小資產階級20%。³⁶ 這種引用馬克斯主義唯物史觀而作的階級分析，在清黨以後的國民黨理論界，無異於洪水猛獸，但陳公博充滿渲染力的文字與激進的政治思想，卻吸引了大批的激進知識分子與黨內青年黨員。

據陳氏自承這兩篇長文所造成的迴響與共鳴，連他自己也大吃一驚：「我萬想不到，這兩篇文章一出，倒哄動一時，雖然說不上洛陽紙貴那套肉麻話，然而自命是革命青年的都必手捧一冊。」³⁷ 1928年5月，陳公博打鐵趁熱，在上海創辦了《革命評論》，陳氏除擔任主編及主要撰稿者外，主要作者群還包括一群國民黨的青年黨員如許德珩、施存統、劉侃元、蕭淑宇等。其他汪派人士也紛起響應，創辦了一批理論相似的刊物，以顧孟餘主持的《前進》為首，改組派的輿論攻勢，一時聲勢浩大。

南京國民政府面對改組派的挑戰，採取了一連串嚴厲的鎮壓措施，1928年8月中出版了18期的《革命評論》週刊被迫停刊。據《中國國民黨年鑒》所載，1929年遭到查禁的改組派報刊共計66種，僅7月份就有《夾攻》、《燈塔》、《戰線》、《暖流》、《民意》、《護黨》、《民眾先鋒》、《革命青年》等24種改組派刊物遭到查禁。³⁸ 1929年後，改組派在南京中央的箝制下，將重心從輿論宣傳轉移至聯絡地方實力派軍人的軍事行動。反蔣的地方軍人為改組派提供了可能的武力後盾，改組派則使反對的地方軍人師出有名，雙方一拍即合，改組派於是停止對「武力指揮黨」與「新軍閥」的輿論攻擊，開始轉移焦點，集中火力於軍事反蔣。

³⁶ 陳公博，〈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陳公博先生文集》，上冊，頁183-262。

³⁷ 陳公博，《苦笑錄》，頁179。

³⁸ 轉引自郭緒印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78。

肆、南京中央的黨營宣傳媒介 ——《中央日報》及《中央畫刊》

1928年6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第144次會議通過並頒布「設置黨報條例」、「指導黨報條例」、「補助黨報條例」等3項有關黨營新聞事業的法規。³⁹南京國民黨中央第一個直屬黨報為《中央日報》，1928年2月1日在上海創刊。⁴⁰不過，在國民黨黨營新聞事業史中，絕口不提的是，早在1927年3月22日清黨前夕，國民黨左派就在武漢創辦了《中央日報》，由汪系的顧孟餘擔任社長，目前這份報紙所能看到的日期至8月19日止，可以合理的推測，這份壽命短暫的《中央日報》，大約終刊於武漢中央和平分共之後，至遲不會晚於8月底。⁴¹

《中央日報》在上海創刊後，一直維持三大張、共12版〔按：當時是以面來描述目前所習稱的版〕的版式，每張第一、二版為廣告版，第三、四版為文字版。第一張的文字版主要刊載國內外要聞及重要文章，第二張文字版設有黨務、政治專欄、本埠新聞及各地通訊等。第三張為專版與副刊，創刊日的副刊為〈經濟特刊〉，以刊載經濟理論文章、國內經濟調查現況為主；其他副刊還包括〈國際事情〉，是研究國際重要問題的理論性文章專版；〈摩登〉為純文藝性副刊，刊載小說、散文等新文學作品；〈商情與金融〉以上海地方金融及商業活動為主，刊載上海市場及金融的行情動態；〈一周間的大事〉則是重點性的介紹一周內所發生的國內外政治、外交、經濟等重大事件。以上這些副刊除〈一周間的大事〉外，皆為不定期刊載，從其多元的主題來看，草創階段的《中央日報》副刊仍然保有五四運動以來注重文藝、鼓吹新知的活潑風格，以及上海地區讀者重視

³⁹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卷，中冊，頁352。

⁴⁰ 臺灣出版的新聞史著作大都採取《中央日報》於1928年2月1日在上海創刊的說法。詳見曾虛白，《中國新聞史》（臺北：三民書局，1984年），頁542-546；賴光臨，《七十年中國報業史》（臺北：中央日報社，1981年），頁123；胡有瑞編，《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臺北：黃天才，1988年），頁42-45；朱傳譽，《報人、報史、報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280-283。

⁴¹ 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611-612；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2卷，中冊，頁354。

商業活動與金融資訊的特性。⁴²

上海《中央日報》共維持了9個月，在「設置黨報條例」頒布後，1928年10月23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派出中央日報社總經理曾集熙、總編輯查光佛前往上海處理接收及遷地事宜，11月1日上海《中央日報》吹起了熄燈號。隔年2月1日，《中央日報》在南京復刊，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葉楚傖兼任社長，沈君甸任總經理、嚴慎予為總編輯。復刊後的《中央日報》，加強了為黨宣傳的色彩，除了上海時期就已提出的「闡明黨義、宣揚國策」外，更強化了新的指導目標：「擁護中央、消除反側、鞏固黨基、維護國本。」⁴³

《中央日報》遷至南京後，南京中央與汪系成員間的分歧，隨著陳公博等人在《革命評論》炮打黨中央的激烈言論，雙方衝突也日趨白熱化。不過仔細爬梳1929年2月至1930年底的《中央日報》，在社論或其他黨務活動專欄中極少有針對改組派的攻擊言論，即使有提及改組派的活動，也是在同一時期遍及全國各地的黨務整理行動中，稍微提及地方黨部對於南京所派去的黨務指導委員的反彈與抗爭，其中往往牽涉到南京中央與改組派間的矛盾。這點非常值得玩味，也值得深究。⁴⁴ 反倒是另一份素來不為人所熟知的《中央日報》副刊——《中央畫刊》，扮演了反對改組派的攻擊手角色，也呈現出與《中央日報》迥然不同的面貌。

正如論者所言，《中央日報》遷至南京發刊的草創階段，一切設備及經費等物質條件極為缺乏，「簡陋已極」，初期發行量約3千份左右，隨報夾送的《中央畫刊》，其流通範圍可能不出南京一地。⁴⁵ 1929年8月3日，《中央日報》發

⁴² 關於《中央日報》副刊的詳細分析，參見趙麗華，《民國官營體制與話語空間：《中央日報》副刊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8-242；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頁612-614。

⁴³ 賴光臨，《七十年中國報業史》，頁124。

⁴⁴ 關於1928-1931年間由南京中央所推動的黨務整理運動，可參見王克文，〈北伐後國民黨之黨務整理〉，《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臺北：國史館，2001年），頁156-166。

⁴⁵ 南京《中央日報》創辦初期的記者、編輯人力極為吃緊，「時有稿荒之虞」。賴光臨也坦承當時人對於《中央日報》的反應是：「內容過於貧乏，京中讀者非加滬報一份，不能滿足閱讀慾望。」參見賴光臨，《七十年中國報業史》，頁123-125。

行附刊《中央畫刊》創刊號，據創刊號發行旨趣所言，《中央畫刊》為週刊形式，每週日發刊，隨南京《中央日報》免費附送，另由中央宣傳部分發各省、市黨部。⁴⁶ 有鑒於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1927-1930年）地方實力派軍人與黨內其他派系對於南京中央的挑戰紛至沓來，國民黨能確實控制的省市地方黨部僅有上海、南京、廣州等少數幾個大城市，所謂由中央宣傳部分送全國各級黨部參考，可能是聊備一格，徒具虛名。⁴⁷

歷來有關民國新聞史的研究中，幾乎從未有人提及《中央畫刊》的存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民國時期不論公營或民營報紙普遍都有副刊（尤其是文藝副刊），副刊可說是民國新聞史中最美麗的一道風景。然而，副刊往往是單獨發行，未必會隨主報一同保存下來，《中央畫刊》的情況便是如此。直到近年，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重印《民國漫畫期刊集粹》，其中選錄了《中央畫刊》，這份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編撰股主持的通俗畫刊才重新被挖掘出來。

1928年起，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基礎逐漸穩固，國民黨宣傳部開始重拾國民革命時期風起雲湧的通俗漫畫文宣，主導者是北伐期間嶄露頭角、政治立場偏右的梁中銘、梁又銘兄弟。梁氏兄弟參與國民革命軍文宣工作的淵源極早，梁中銘於1925年初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革命時期先後為中央宣傳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繪製宣傳漫畫；1928年起任《中央畫刊》、《革命軍人畫報》等黨營畫報主編；1932年出掌軍事委員會政治處藝術股長，抗戰爆發後兼任黨營《陣中畫報》社長，長期執國民黨圖畫宣傳工作之牛耳。梁又銘則追隨其兄，投身國民黨的通俗宣傳事業，也是在《中央畫刊》上刊登作品數量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供稿者。⁴⁸

《中央畫刊》採取以漫畫為主、照片為輔的編輯形式，甚至在辛亥開國、孫中山逝世紀念等特定政治專輯中，也常以漫畫的形式來表達。不過，本文之所以選擇《中央畫刊》有關反改組派主題的漫畫進行探討，確是有鑒於1929-1930年間《中央畫刊》針對改組派的漫畫攻擊，不論就創作數量之多或主題之集中，確

⁴⁶ 《中央畫刊》，創刊號（1929年8月3日），《中央日報》副刊，南京。

⁴⁷ 關於南京國民政府在1928-1930年間對於各省市地方黨部的控制情形，可參見王克文，〈北伐後國民黨之黨務整理〉，頁160-161。

⁴⁸ 〈梁中銘先生事略〉，頁432。

實是一個突出的現象。1929年10月10日《中央畫刊》的〈雙十節特刊〉中，首次刊登了針對改組派的文宣漫畫，作者署名郭琇暢，關於作者的生平及背景，就目前資料所及，可說是付之闕如；該幅漫畫的繪圖技巧頗嫌拙劣，構圖主題與旁白文字間亦無明顯關連，但這幅作品的意義在於敲響了南京中央運用通俗文宣反擊改組派的第一聲，從此揭開了《中央畫刊》代表南京中央展現反改組派文宣的急先鋒。



圖7、改組派瞎造謠言

資料來源：郭琇暢，〈雙十節特刊〉，《中央畫刊》，南京，1929年10月10日，版4。

伍、《中央畫刊》反改組派漫畫的類型與主題

《中央畫刊》自1929年10月20日出刊的第十二號起，大量刊載攻擊改組派的漫畫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創作者是主編梁中銘之弟梁又銘。據筆者統計，梁又銘的作品占《中央畫刊》反改組派漫畫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他作者的創作不但甚少，且幾乎都用筆名，如子谷、光郎、鐵玄、井后等人，這些使用筆名的作者，由於史料不足，已難確認其真實身分，甚至有不少《中央畫刊》上的漫畫未註明作者。《中央畫刊》針對改組派的漫畫宣傳攻勢，大致可依其類型及主題，區分

為以下5個論述重點：

一、民族主義的指控：改組派與蘇俄、中央的關係

國共兩黨自1927年4月因清黨分道揚鑣後，此後近70年的漫長歲月裡，國共內戰除了像雙方所說的意識形態之爭外，更像是在中國境內進行一場尋找漢奸的遊戲，一邊攻擊對方是美帝走狗，另一邊是俄帝派駐在中國的第五縱隊，彷彿將這場中國人之間的內戰變成是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之爭，國共兩黨之間的差異僅在於敵我角色的對調與互換。然而這種民族主義式的指控，從1920年代起就已現端倪。在梁又銘〈蘇俄玩弄改組派之真相〉漫畫中，改組派騎在青年身上，背後是蘇俄亦步亦驅的打更指使。另一幅則將改組派畫成一隻狗，被蘇俄玩弄於股掌之間。



圖8、蘇俄玩弄改組派之真相

資料來源：梁（又銘），〈蘇俄玩弄改組派之真相〉，《中央畫刊》，第12號，南京，1929年10月20日，版2。



圖9、改組派——蘇俄的走狗

資料來源：〈改組派——蘇俄的走狗〉，《中央畫刊》，第14號，南京，1929年11月3日，版2。



圖10、改組派的伎倆

資料來源：梁又銘，〈改組派的伎倆〉，《中央畫刊》，第16號，南京，1929年11月17日，版4。



圖11、遍地害蟲，蠶食國庫

資料來源：梁又銘，〈遍地害蟲，蠶食國庫〉，《中央畫刊》，第34號，南京，1930年3月23日，版2。

至於梁又銘所繪的〈改組派的伎倆〉中，附圖文字說道：「這次改組派聯合一切反動分子，企圖一逞他這種螳臂當車的舉動。……記得從前有一個奸狡的妓女，她把一隻鞋子踹著甲客的足，同時用手暗示著乙客，口卻對丙客說道：『我愛您呀！』這就是改組派的伎倆！」⁴⁹ 而在象徵改組派的妓女身旁，互通款曲的一共有3個人，身上分別寫著白色帝國主義、赤色帝國主義及東洋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指控躍然紙上。而在梁又銘的另一幅作品裡，指稱蘇俄在1930年初提供850萬的金錢援助，分食這塊大餅的蛇、鼠及爬蟲等，身上分別掛有改組派、軍閥、中共及土匪的牌子，這種近乎莫虛有的指控，也只有在漫畫這類通俗宣傳裡，才能肆意揮灑展現。而從1930年下半年起，中共開始在湘、贛等地進行一連串的城市武裝暴動，但在《中央日報》及《中央畫刊》等黨營宣傳刊物裡，普遍出現將改組派與中共視為一丘之貉的論調。在題為〈改組派者即共產黨之變相〉作品裡，表面上看來當時在長江流域各省發動武裝行動的是中共，但畫中所呈現

⁴⁹ 梁又銘，〈改組派的伎倆〉，《中央畫刊》，第16號，南京，1929年11月17日，版2。

的意象，實際手持殺人、放火武器者卻是身穿改組派外衣的藏鏡人，似乎暗指這一切暴行都是在改組派的煽動下行事。依南京中央黨營媒體的論述邏輯來看，雖然並無改組派與蘇俄有直接聯繫的證據，但改組派作為代表擁護聯俄容共政策的國民黨激進左派，無異是中共的同路人，也顯見清黨後南京中央日趨極端的黨同伐異立場。這也可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在1929-1930年間的《中央畫刊》漫畫文宣裡，針對中共的攻擊極少，我們可以合理的推論，對於南京中央而言，或許此一階段改組派比起已擎起武裝暴動大旗的中共具有更大、也更立即的威脅。



圖12、改組派者即共產黨之變相

資料來源：〈改組派者即共產黨之變相〉，《中央畫刊》，第55號，南京，1930年8月17日，版2。

二、發動內戰與破壞統一：改組派與實力派軍人的關係

1929年後，改組派在南京中央的一再打壓下，將重心從輿論宣傳轉移至聯絡地方實力派軍人的軍事行動。的確改組派這批手無寸鐵的文人黨員，幾年來在黨內的競爭下節節敗退，關鍵就在缺乏地方實力派軍人的鼎力支持，1929年5月改

組派上海總部的王樂平等人糾集一些地方實力派代表及各種反蔣組織，在上海發起成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著手建立護黨救國軍。1929年9月汪精衛的嫡系將領張發奎在湖北宜昌武裝叛變，到1930年5-10月的中原大戰止，改組派結合國內實力派軍人，在反蔣與反對南京中央的共同目標下，展開一連串的軍事行動。



圖13、叫化子食死蟹隻隻好！

資料來源：梁又銘，〈叫化子食死蟹隻隻好！〉，《中央畫刊》，第12號，南京，1929年10月20日，版2。



圖14、改組派的舞臺即將傾覆

資料來源：光郎，〈改組派的舞臺即將傾覆〉，《中央畫刊》，第14號，南京，1929年11月3日，版4。

改組派一向指責蔣中正為首的黨內軍事領袖，藉由軍權奪取黨權，如今改組派自己也自棄黨統，與過去要打倒的新、舊軍閥合作，國民黨宣傳部自然不會放棄這個極佳的攻擊焦點，在梁又銘的〈叫化子食死蟹隻隻好！〉中，運用民間諺語，將改組派比喻為叫化子，拿著寫有吳佩孚、張宗昌、吳光新、安福系的死蟹，愛不釋手。值得玩味的是，不知是否國民黨宣傳部的情報太過糟糕，或是梁又銘在創作時有其他的考量，與改組派密切合作的地方軍人如張發奎、唐生智、俞作柏、李明瑞，到日後中原大戰時的馮玉祥、閻錫山及李宗仁等，雖如走馬燈式地來來去去，就是沒有這群既過氣、也無實力的北洋軍人。從圖14-17裡，創作主題都在強調改組派與張發奎、唐生智、俞作柏、李明瑞、馮玉祥、閻錫山及

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軍人的合作，無非是同床異夢，隨時都有坍塌的可能。正如子谷的「叛變之路」而言，改組派與馮、閻的結合，就像是一個瞎子背著一個瘸子準備要過橋：「他倆的結合是目前的利用，不能持久的！是殘廢的結合，終歸失敗的！」⁵⁰



圖15、同床異夢

資料來源：〈同床異夢〉，《中央畫刊》，第14號，南京，1929年11月3日，版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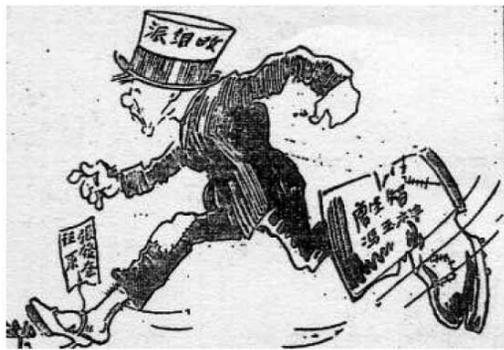


圖16、自稱革命的改組派之立場

資料來源：〈自稱革命的改組派之立場〉，《中央畫刊》，第25號，南京，1930年1月19日，版4。

⁵⁰ 子谷，〈叛亂之路〉，《中央畫刊》，第37號，南京，1930年4月13日，版1。



圖17、叛亂之路

資料來源：子谷，〈叛亂之路〉，《中央畫刊》，第37號，南京，1930年4月13日，版1。

三、支持改組派的群眾基礎：青年國民黨員

改組派的主張，反映清黨之後國民黨內新進、年輕黨員的想法，也道出了他們的心聲。這些黨員絕大多數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加入國民黨，他們認同的是當時國民黨的激進政綱，帶有濃厚的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反封建色彩，並且與群眾運動緊密結合。而改組派內的頭號健筆——陳公博等人，在充滿渲染力的文字與熱情澎湃的政治言論下，的確吸引了大批的激進知識分子。改組派雖然失去對黨中央的領導權，卻發現他們的主張對黨內青年黨員的強大號召力，是改組派唯一能與南京中央一搏的籌碼。對此，陳公博有著一針見血的觀察，認為清黨之舉造成聯俄容共時期才加入的青年新進黨員，在意識型態上的衝突與掙扎。⁵¹ 因此，《革命評論》每期發行量達到1萬5千冊的高峰，其對青年知識分子的影響力

⁵¹ 陳公博，《苦笑錄》，頁179。

可見一斑。⁵²



圖18、盲人騎瞎馬，夜半過危橋

資料來源：梁又銘，〈盲人騎瞎馬，夜半過危橋〉，《中央畫刊》，第14號，南京，1929年11月3日，版1。



圖19、拆穿西洋鏡，改組派現原形

資料來源：〈拆穿西洋鏡，改組派現原形〉，《中央畫刊》，第14號，南京，1929年11月3日，版2。

而南京中央對於大批青年倒向改組派，不可能無動於衷，在《中央畫刊》的漫畫作品裡有許多是針對附從改組派的青年黨員，例如在梁又銘的〈瞎子摸大象〉中說道：「……現在的青年受了改組派反動言論的蠱惑，往往曲解本黨三民主義，遂致陷於錯誤而不自知，誠使本黨痛心無已！青年們！我們須要澈底去研究，去了解三民主義，不要遇著某一種理論即曲解盲從，致貽瞎子摸象之譏，終至不克復救。」⁵³ 梁氏另以磨坊裡矇著眼的驢子比喻這些青年：「現在有一班盲目的青年，受了改組派的哄騙，拼命地幹那反革命的工作，還以為自己非常努力、非常革命，奔走終日，無非做他們的工作，與那磨坊裡的驢子何異？」⁵⁴ 值

⁵² 陳公博，《苦笑錄》，頁180-181。陳公博在上書中稱《革命評論》每期發行1萬5千冊，而在另一本回憶《寒風集》中，則說是3萬5千冊。見《寒風集》，甲篇，頁276。

⁵³ 梁又銘，〈瞎子摸大象〉，《中央畫刊》，第17號，南京，1929年11月24日，版1。

⁵⁴ 梁又銘，〈磨坊裡的驢子！〉，《中央畫刊》，第18號，南京，1929年12月1日，版1。

得觀察的重點，不在於改組派吸引了多少青年黨員的支持，反倒是從宣傳的敵對角度，驗證了南京中央所感受到來自於改組派的威脅與挑戰究竟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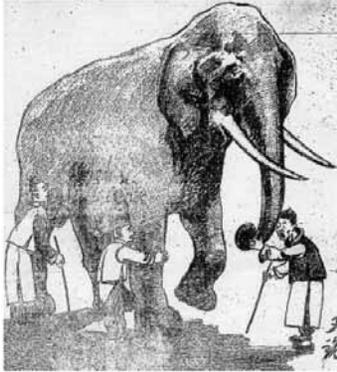


圖20、瞎子摸大象

資料來源：梁又銘，〈瞎子摸大象〉，
《中央畫刊》，第17號，
南京，1929年11月24日，版
1。



圖21、磨坊裡的驢子

資料來源：梁又銘，〈磨坊裡的驢子！〉，
《中央畫刊》，第
18號，南京，1929年12月1
日，版1。

四、對改組派個別人物的攻擊

在《中央畫刊》的漫畫作品裡，遲至1929年底才有針對汪精衛的主題，在此之前，漫畫中提到的改組派人物，都是將矛頭指向陳公博，例如圖22中，此時的改組派正在運作廣西的俞作柏、李明瑞進行反蔣軍事行動，作者光郎將雙方的結合比喻為行將傾坍的危樓，危樓中那個搖搖欲墜的人物，身上寫著陳公博的名字，危樓的兩個基座分別是俞作柏與李明瑞。然而，從1929年底起，《中央畫刊》的攻擊焦點轉向汪精衛身上，其原因可能是1929年10月，汪氏自歐返國，親自指導反蔣護黨的軍事行動，原先汪精衛還維持一個超然地位，與改組派保持距離，如今既然汪氏公然舉起反蔣大旗，雙方表面上僅存的和諧關係已蕩然無存，南京中央於是大舉向汪精衛發起近乎人身攻擊的宣傳攻勢。



圖22、改組派的舞臺真相

資料來源：光郡，〈改組派的舞臺真相〉，《中央畫刊》，第12號，南京，1929年10月20日，版2。



圖23、烏鴉與惡犬

資料來源：梁又銘，〈烏鴉與惡犬〉，《中央畫刊》，第22號，南京，1929年12月29日，版1。

在圖23中，梁又銘將汪精衛比喻為一隻立在枝頭的烏鴉，口中銜著象徵汪氏投身革命的光榮歷史，樹下站的是寫著共產黨的一隻惡犬，梁氏認為：「汪精衛在我們黨國裡，總算有一番光榮的歷史，誰也不能否認的，可是現在給狡猾的共產黨同他帶上一個革命的高帽子，他便得意洋洋地把過去的歷史出賣了，和那好勝的老鴉何異？」⁵⁵ 另外，在鐵玄的作品裡，將汪氏形容為在鏡子前一再更換新衣的喜新厭舊之士，一旁是指揮汪氏該穿什麼衣服的共產黨，汪氏的新衣分別寫著「改組本黨」、「反對特委」、「三大政策」及「革命左轉」的文字，對於汪氏在政治上的忽左忽右，極盡嘲諷之能事。圖25則將汪氏比喻為依附在大老虎身旁的走狗，大老虎身上分別寫著共產黨、唐生智、張發奎及馮玉祥。

在這些直接指向汪精衛的漫畫作品裡，圖26-28特別值得留意，分別以珠光寶氣、身著旗袍的女性形象、人面狐身的狐狸精妖婦造型，以及運用照片合成的具象的人頭狗身，對汪精衛恣意進行尖銳的人身攻擊與醜化謾罵。在南京中央的漫畫宣傳中，屢屢將汪氏以女性的形象表現，筆者雖然尚未在史料中找到足以論

⁵⁵ 梁又銘，〈烏鴉與惡犬〉，《中央畫刊》，第22號，南京，1929年12月29日，版1。

斷宣傳機器及創作者的動機，但這絕對是性別史研究的絕妙素材，除了汪精衛之外，在民國政治漫畫中極難找到其他政治人物像汪精衛一般被比附為女性的角色，如果說性別的本質反映的是一種權力的高下關係，那除了汪向來被時人所強調的俊美外表外，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也反映了另一種政治上根深蒂固的權力關係。⁵⁶ 而將汪精衛描繪為人面狗身的形象，無疑是一種毫不掩飾的醜化手法，也顯示雙方已從國民黨內不同派系的路線之爭，轉變為類似國共兩黨在政治道路上的生死存亡之戰，更是政治暴力的赤裸展現。正如筆者在另一篇有關1950年代臺灣政治漫畫的探討中，臺灣的政治文宣在此時期大量運用動物形象來比擬中共的政治領袖如毛澤東、朱德，當時琅琅上口的政治口號為「殺豬拔毛」，這可能是要傳達中共泯滅人性的意涵，既然敵人已經沒有做為人的特質（人性），那用暴力消滅他們，也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之事。⁵⁷



圖24、善變的汪精衛

資料來源：鐵玄，〈善變的汪精衛〉，
《中央畫刊》，第22號，南
京，1929年12月29日，版
4。



圖25、狐假虎威

資料來源：〈狐假虎威〉。《中央畫
刊》，第26號，南京，1930
年1月26日，版4。

- ⁵⁶ 在章詒和的回憶《往事並不如煙》裡，提到其父章伯鈞曾對她品題民國時期政壇上的美男子，其中公認的第一美男子是汪精衛，甚至轉述胡適所言，如果要嫁，一定要嫁給汪精衛。見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頁35。
- ⁵⁷ 張世瑛，〈訴諸恐懼：1950年初期臺灣政治漫畫的風格〉，收入余敏玲主編，《兩岸分治——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1945-200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頁187-189。



圖26、嗚呼今日之汪精衛！

資料來源：子谷，〈嗚呼今日之汪精衛！〉，《中央畫刊》，第54號，南京，1930年8月10日，版2。



圖27、狐狸精顯原形！

資料來源：井后，〈狐狸精顯原形！〉，《中央畫刊》，第55號，南京，1930年8月17日，版4。



圖28、汪精衛的真面目

資料來源：亘心，〈汪精衛的真面目〉，《中央畫刊》，第55號，南京，1930年8月17日，版4。

五、國民黨的法統之爭

汪精衛及改組派能與南京中央分庭抗禮的武器，可以從汪氏強調黨紀一事看出，對黨的組織、紀律與法統的堅持本是改組派攻擊黨內軍權高漲和蔣中正獨裁

專政的理論基礎，尤其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汪系人物對三大大會的攻擊，就在於絕大多數的黨代表都是由黨中央指派而非票選產生，無法代表黨意。然而，等到1930年上半年時，改組派聯合國內實力派軍人，在平、津等地以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聯席會議的名義重啟反蔣大旗。為了遷就政治現實，原本堅持黨統的改組派也不得不與原先的敵人如西山會議派等其他派系合作，放棄維護黨的組織與紀律的原則，也放棄對黨統的堅持。

此時的國民黨宣傳部採取「以彼之道、還諸彼身」的策略，用相同的語言攻擊以改組派為首的所謂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同樣也是不符改組派的黨統標準，黨代表冒名頂替等情事，照樣也比比皆是，雙方僅是五十步笑百步。事實上，改組派對此是難以自圓其說的，正如王克文的研究所言：「汪氏對國民黨領導權的急切追求，事實上是孫中山死後黨內繼承人之爭的延續。」此一繼承人之爭，最後吞噬了清黨後的意識形態之爭，使汪氏無法再顧及所謂「激進路線之存廢。國民黨左派的瓦解，因此是自上而下的瓦解，領袖比群眾先放棄了立場。」⁵⁸



圖29、偽中央法統

資料來源：梁又銘，〈偽中央法統〉，《中央畫刊》，第28號，南京，1930年2月9日，版4。

⁵⁸ 王克文，〈分共之後——汪精衛與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頁154。

陸、結論

《中央畫刊》第三十六期的編輯部廣告裡，刊登了一則梁又銘的啟事，宣布辭去國民黨宣傳部編撰科的一切職務，也退出《中央畫刊》的編務工作。⁵⁹ 由於相關資料付之闕如，無法得知梁又銘此舉的前因後果，只是梁此舉的後續影響頗為深遠，1930-1949年間梁又銘再也沒有在《中央日報》等國民黨黨營文宣報刊中發表漫畫作品。⁶⁰ 梁又銘離開後，《中央畫刊》仍然持續了十個多月，直到1931年2月22日發行第八十二期後終刊。

嚴格說來，本文題旨雖是探討國民黨內以蔣為首的南京中央與奉汪為領袖的改組派間在1928-1931年間所進行的一場通俗宣傳戰爭。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場從一開始就不對等的漫畫戰，改組派一方從未運用漫畫這項媒介向南京中央發出戰爭號角的工具。箇中原因，與其說是改組派內缺乏漫畫文宣人才，更重要的是從1920年代起政黨的文宣漫畫主要是透過報紙及宣傳部門發放的傳單為媒介，而發行報紙及傳單背後都需要公部門或黨機器的龐大資源。1927年武漢國民政府結束後，作為在野的改組派面對南京中央鋪天蓋地而來的打壓及查禁，就現實狀況而言，是不可能運用漫畫這項通俗文宣，也極度缺乏所需要的媒體空間。

至於南京中央針對汪政權的漫畫文宣，如果以政黨宣傳的角度觀之，不難發現一個極為重要的特徵，即宣傳文字與漫畫圖象之間顯現高度的一致性。就這點而言，1928-1931年間南京國民黨中央的宣傳部門及其所展現的宣傳成果絕對值得我們重新評估與認識。在這段時期，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出版了大量的宣傳手冊，其中不少是針對改組派的小冊子，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行的《改組派之真面目》為例，書中一再提到改組派的最大罪惡為：「一、構煽內亂、蓄謀篡竊。二、勾結蘇俄、辱國媚外。三、買空賣空、欺騙青年。」⁶¹ 其他的文宣小冊也有相似論調，這和前節所述《中央畫刊》的漫畫主題幾乎如出一轍，顯見南京國民

⁵⁹ 〈梁又銘啟事〉，《中央畫刊》，第36期，南京，1930年4月6日，版1。

⁶⁰ 梁又銘雖然辭去黨部工作，不過其兄長梁中銘並沒有共進退，仍然留在國民黨宣傳部服務。

⁶¹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改組派之真面目》（南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929年），頁55-56。

黨中央從上到下的宣傳工作，的確有著一群使心向臂、前後呼應，上下運行頗佳的文宣隊伍。

據郭緒印《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一書對南京中央宣傳工作的評價：「蔣介石對改組派的理論駁斥，多係造謠中傷、人身攻擊。自然沒有說服力、收效不大。」⁶² 但從《中央畫刊》的漫畫裡，除了負面的人身攻擊外，所運用的主題與語言還包括改組派與地方實力派軍人的勾結、民族主義的指控（與蘇俄、中央的關係）及蠱惑國民黨青年黨員等。可以看到蔣主導的南京中央與奉汪為精神領袖的改組派互相攻訐之激烈。對南京中央來說，或許在這段時間裡，改組派才是最重要的黨內敵人。此外，1920年代後期可能是南京國民黨中央最有活力、也最有宣傳動能的一段短暫光陰，從改組派與南京中央間激烈的宣傳戰裡，不難窺得一二。

南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指導下的《中央畫刊》，所刊載的政治漫畫在畫作的風格、技巧及作法上，所要傳達的重點並非是用抽象的筆法描繪戰爭與敵人的恐怖，與訴諸情感的傷逝，反倒是用直觀的暴力場景，具體呈現敵人的罪惡與傷害。這樣的漫畫語言，所要訴諸的共鳴，是被宣傳者內心的仇恨與憤怒。而在西方漫畫中常用的象徵筆法，在中國就極為少見。整體而言，民國時期中國的政治文宣漫畫，普遍缺乏流暢的技巧與筆法。⁶³

中國大陸時期的國民黨，雖然在1924年改組後，仿效蘇聯共產黨的模式，落實黨機器內的宣傳部門，但過去的研究都認為，國民黨漫畫文宣表現較有成績的時間都是在國共合作時期（1924-1927年、1937-1938年）。不可諱言的，共產黨人的確在國民黨文宣隊伍內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過去長久累積的既定印象，咸強調清黨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國民黨為了清除共產黨人的滲透與操控，在將洗澡水倒掉的同時，也將洗澡盆中的嬰孩一併倒掉了。但透過本文對於1928-1931年《中央畫刊》的再理解與再詮釋，可以確定清黨之後，國民黨並未就此割捨漫畫宣傳，然而，這段時間非常短暫，1931年後，國民黨的文宣部門不再著力於漫畫等通俗文宣，也幾乎沒有漫畫作品，確實的原因還需要更多史料的佐證。回顧

⁶² 郭緒印，《國民黨派系鬥爭史》，頁77。

⁶³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pp. 97-98.

1926-1937年的南京十年，國民黨的宣傳組織與各種通俗宣傳在黨內不同派系與中國共產黨的裡外交迫下，黨部宣傳搖擺於左、右之間的政治立場與創作理念，明顯帶著揮之不去、欲掩彌彰的曖昧性與模糊性。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中國國民黨宣傳部報告」，1925年，毛筆原件，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
- 「第三軍政治部工作報告」，1927年1月20日，毛筆原件，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

二、史料彙編

-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清代報刊圖畫集成》。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2000年。
-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2003年。
-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2005年。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文獻》。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6年。

三、年鑑、辭典、工具書

- 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4年。

四、文集、回憶錄、訪談錄、事略傳記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國父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年。
-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5輯。臺北：國史館，

1986年。

陳公博，《陳公博先生文集》。香港：遠東圖書公司，1967年。

陳公博，《寒風集》。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年。

陳公博著，汪瑞炯、李鏢、趙令揚編註，《苦笑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

五、報紙

《中央畫刊》，《中央日報》附刊，南京，1928-1930年。

六、專書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改組派之真面目》。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929年。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

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臺北：國史館，2001年。

王宗華主編，《中國大革命史，1924-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朱傳譽，《報人、報史、報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

余敏玲主編，《兩岸分治——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1945-200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李衣雲，《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12年。

李忠清、楊小民編，《漫畫時政》。北京：現代出版社，1999年。

李孝悌，《清末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年。

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北：一方出版社，2003年。

胡有瑞編，《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臺北：黃天才出版公司，1988年。

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

國軍政工史編纂委員會編，《國軍政工史稿》。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1960年。

- 畢克官，《中國漫畫史話》。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82年。
- 郭緒印，《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 曾虛白，《中國新聞史》。臺北：三民書局，1984年。
- 森哲郎著，于欽德、鮑文雄譯，《中國抗日漫畫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
- 黃遠林，《中國漫畫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年。
- 黃遠林，《百年漫畫》。北京：現代出版社，2000年。
-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 趙麗華，《民國官營體制與話語空間：《中央日報》副刊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2年。
- 鄧宗聖，《入鏡路徑：視覺媒體創作與方法》。臺北：麗文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
- 蕭湘文，《漫畫研究：傳播觀點的檢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
- 賴光臨，《七十年中國報業史》。臺北：中央日報社，1981年。
- Fitzgerald, John.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 Hung, Chang-tai.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七、期刊論文

- 王克文，〈陳公博與國民黨改組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4期（1997年5月）。
- 呂芳上，〈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後的宣傳刊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期（1974年6月）。
- 呂芳上，〈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1920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為例的討論〉，《1920年代的中國——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23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2年。
- Coupe, W. A. "The German Cartoon and the Revolution of 1848."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 (January 1967).
- Kemnitz, Thomas M. "The Cartoon as a Historical Sour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4:1 (Summer 1973).

八、未出版學位論文

陳逢申，〈戰爭與文宣：以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話劇・音樂及漫畫為例（1937-1945）〉。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

Wang, Ke-wen. "The Kuomintang in Trasition: Ideology and Factionalism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2."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5.